

用党的初心校准改革开放的实践

朱佳木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用党的初心不断校准改革开放的实践，凡是符合初心的就坚持就发展，凡是不符合初心的就调整就纠正。所谓党的初心，概括起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的，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永远不脱离群众、不漠视群众疾苦。所谓用党的初心校准改革开放的实践，就是要用以上三条标准衡量和检验改革开放的实践。其中包括：改革开放有无方向和应当以什么为方向，经济体制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正面宣传为主要不要积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新时期还要不要革命，等等。只要我们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明的方向继续前进，体现党的初心、更加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改革开放新天地就一定呈现在世人面前。

【关键词】党的初心 改革开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者简介：朱佳木（1946-），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北京 10073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党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①。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最大的实践有两个，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里说的“表”和“标”，最大的莫过于党的初心。因此，要求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实际上就是要求用党的初心校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一个政党的初心，首先是指这个党成立时确立的奋斗目标，以及后来对这个目标的不断完善。我们党成立之初，确定党的名称叫“中国共产党”，这本身就表明了党的初心。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党要通过武装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区分，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些清楚地表明，我们党的初心即党的远大奋斗目标和最高纲领，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后来，根据中国当时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我们党又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近期奋斗目标和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所以，毛泽东当年说，我们党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②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领导人民适时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随着实践的深入，逐渐认识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发

^①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人民日报》2018年7月1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页。

展历程中还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为此相应地制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上过程说明，我们党不同时期的当前奋斗目标和最低纲领是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的，但其奋斗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纲领，即党的初心，是始终不变的。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40多年来，我们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闯，干出了一片新天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然而，无须讳言，这个过程也存在种种偏离党的初心的现象。对此，历届党中央都曾给予极大关注，并以极大努力加以纠正。这从历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从接连开展的各种主题的党内教育活动和不断印发的各种纪律条例、规定中也可以看出来。在全党努力下，这些现象有的得到了改变，也有一些沉淀下来，伴随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建设的日益发展而累积。在党的十八大之前，诸如分配差距大、意识形态乱、腐败弊病重、生态环境差等问题，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上述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不能不看到其中有认识论上的原因。我国是一个有近14亿人口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改革开放后，在不改变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同国际经济接轨，不仅无先例可循，而且本身就存在很大矛盾和风险，没有一个矛盾逐步暴露和使自己逐步认识矛盾、摸索规律、积累经验的过程不行。毛泽东说过“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①同样，要取得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正确认识，也必须有一个较长的时间。

另外，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事物发展的三大规律中，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显现，相对于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来说，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马克思曾借用黑格尔的术语，把这一规律在人类社会中的表现概括为正题、反题、合题的过程。就是说，如果历史发展中的肯定是一个正题的话，那么对它的第一次否定就是一个反题，而对这个反题的否定，即对否定的否定，便是历史的合题。在否定的否定过程中，每次否定对于过去都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有所取舍的扬弃。人类历史正是在这一规律作用下，呈现出了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状态。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时，改革开放进行了整整34年，从时间上已经超过改革开放前的29年。因此，各种矛盾暴露得可以说比较充分了，解决矛盾的经验也积累得比较丰富了。更重要的一点是，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上，贯通总结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切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进入了认识论所说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阶段，也使改革开放的实践进入了辩证法所说的否定之否定阶段，使我们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主观上具备了站在螺旋式上升运动中更高级螺旋的高度，从而能够用党的初心校准改革开放的实践。

对于党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近几年做过多次论述。把这些论述归纳起来，可以概括成三条，即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永远不脱离群众、不漠视群众疾苦。只要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举措，便不难看出我们党正是在用以上三条，不断衡量和检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9、321页。

验着改革开放的实践，凡是符合的就坚持就发展，凡是不符合的就调整就纠正。

一、关于改革开放有无方向和应当以什么为方向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的态度一向十分明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讲，全党全国人民要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但前提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思想方式，但其本质是“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①。此后不久，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②后来，他还多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③

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尽管从一开始就表明了态度，但斗争并没有因此停止。正如邓小平所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就在这个争论过程中，发生了“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的问题。邓小平对此解释说“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④可见，在改革究竟以什么为方向的问题上，斗争不仅始终存在，而且还是非常激烈的。

进入新时代，面对“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方向，无所谓社会主义方向还是资本主义方向”，“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现在需要重启改革”等论调，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了针锋相对的驳斥。他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既然如此，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什么要快改，什么要慢改，当然都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标准。习近平总书记说，怎么改、改什么，有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底线，“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⑤。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他重申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⑥。

在据理批驳那些指责我们不改革的各种言论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深刻揭露了这些言论背后的目的和照着做的恶果。他表示“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1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324、380页。

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15页。

⑥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8页。

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①如果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剪裁我们的实践，最后结果要么跟着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只有挨骂的份。他强调：“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②

由于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坚持用党的初心校准改革开放的实践，在改革开放有没有方向、以什么为方向的问题上亮明了自己观点，使那些妄图引诱我们朝资本主义方向改的敌对势力找不到半点可钻的空子。

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是要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不提高效率。于是，有人在提高效率上做文章，散布所谓“经济人假设”，“只有私有制才有效率”，“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市场经济是永恒的”等新自由主义观点；鼓吹“政府作用越小越好”，“收入分配差距要进一步拉大”，“没有几千万人下岗就没有另一部分人享受”等错误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一度很是时兴，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到改革的理论和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用党的初心校准改革开放实践的过程中，坚决果断地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党的初心的改革思路进行了调整。

1. 改革究竟应当以什么为中心？

认为公有制效率低、收入分配应进一步拉大差距等观点，说穿了是把效率作为了改革的中心，把效率与公平放到了相互对立的位置，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讲公平就不能讲效率，讲效率就不能讲公平。在这种观点影响下，有的文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进而提出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改革举措，成为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政策上的原因，致使反映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使部分低收入群体生活陷入了困境^③。

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已经注意到了，并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逐渐改为“既重视效率也重视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等。然而，却始终未能跳出把效率与公平当成一对矛盾的圈子。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不再并提“效率与公平”，而是把处理这对关系置于发展和改革都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总的指导思想之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便提出，要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④。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首先，改革必须给人民群众更多的获得感。他强调，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⑤。他具体列举了许多人民群众对改革最关心最期盼的问题，如食品安

①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9页。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③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世纪80年代初为0.3左右，2003年为0.48，2008年为0.49，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0.4，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在0.24-0.36之间。

④ 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52-553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3页。

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里的水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住房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等。他反复提醒大家“过去有饭吃、有学上、有房住是基本需求，现在人民群众有收入稳步提升、优质医疗服务、教育公平、住房改善、优美环境和洁净空气等更多层次的需求。”因此，民生工作要跟上形势的发展。他说“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①

有人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不宜过早强调共同富裕。针对这种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分配优先于发展的说法当然不符合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②。“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③他要求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其次，改革必须紧紧抓住和解决损害群众权益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批评过去一个时期，一些城镇建设中出现的让老百姓诟病的问题，如大拆大建、争盖高楼、遍地是工地，建设缺乏特色、风格单调、贪大求洋，追求干部任期内的视觉效果、漠视历史文化保护、毁坏城市古迹和历史记忆，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不配套，给市民带来极大不便，等等。对于住宅越盖越多，价格却越抬越高，不缺住房的人大量买房，而急需住房的人却一房难求的现象，他明确表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④，要求今后多盖公租房。他还批评一些地方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工作中搞所谓“三集中”，逼农民进城、上楼的做法是让农民“被落户”“被上楼”。针对一些地方对群众报警求助置之不理、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等现象，他指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⑤

党的十八大后的6年多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线以下人口减少了80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8年底的1.7%^⑥。党和政府还实施精准扶贫，全力以赴地确保2020年基本实现农村全部脱贫。这些都说明，用党的初心校准改革开放实践的行动已经初见成效。

2. 改革究竟还要不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改革开放后，随着个体、私营、合资经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出现，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然而，新自由主义信奉者们却一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7、19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69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27页。

④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7页。

⑤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8页。

⑥ 参见《6年减少贫困人口8000万，中国总体上实现“两不愁”！》，<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73807933&ver=1975&signature=cleoXpf6APeEOeKo9Jm3R2uHvz0YtunBY28LRtRtBVgBDeLA5SWwP9wliXPvB4eKWCmG55ShcOjvtjuvQNsiNiMJ46fr8dZuTUxnpb8oIACBNCQztrPihLB2ApCyRm4E6l&new=1>。

边宣扬经济转型“要靠私有化推动”，鼓吹“要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也是党的执政基础”等论调；一边攻击、抹黑国有企业，编造所谓国有企业“低效论”“垄断论”“与民争利论”等，散布所谓“国进民退”的舆论，制造所谓“冰棍理论”，说什么“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晚卖不如早卖”，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提出“要把国有企业量化到个人”等谬论。在这股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一些国有企业被贱卖给了外国公司，或被民营企业以“白菜价”收购，造成国有即全民所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面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喧嚣，一方面反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纳入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这一总的指导思想之下，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责任，是保障人民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许多投资大、收益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许多周期长、风险大的基础性研发，许多国防科技工业的重大项目，许多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抗击救援，许多脱贫攻坚、改善民生的项目实施，都是国有企业扛起来的。”他揭露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的企图，说“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他告诫对这个问题还存在模糊的、似是而非、甚至错误观念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要从政治上看，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不能稀里糊涂跟着喊口号，更不能中别人的圈套。“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怎么坚持和发展？”^①

在要不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如何看待农村土地“确权”的问题。随着农村分工分业发展和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相当一部分承包土地的农民不种地了，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农民家庭越来越多，承包权、经营权两个主体分离，成为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对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这时，一些人又乘机出来鼓吹什么要“把土地还给农民”，“要进行第二次土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义正词严地指出“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就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农村最大的制度。”^②“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③在党中央的鲜明表态下，这股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歪风才得以刹住。

3. 改革究竟还要不要发挥政府宏观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资源配置由过去单一计划手段变为计划手段为主、市场手段为辅。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而计划和价格、金融、税收等手段被统统纳入宏观调控范畴。这时，经济学界有些人跑出来制造“市场万能论”，攻击宏观调控仍然是“计划经济痕迹的残留”，提出要搞所谓“大市场、小政府”，鼓吹“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今后政府只要做好市场服务就行了”等观点。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93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68页。

^③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6页。

其实，关于搞市场经济还要不要国家宏观指导、要不要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早在党的十四大上确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目标时就明确提出，这一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以为搞市场经济可以离开国家宏观指导和调控，可以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的观点完全是一种误解。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为了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发展生产要素市场、统一市场规则、促进市场竞争、转变政府职能、抑制消极腐败现象，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改为“起决定性作用”。然而，这并不等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就要被削弱。习近平总书记从对市场作用做出这一新的定位之始就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①“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②他还针对政府对市场要少管甚至不管的主张指出，政府要切实履行好服务职能，同时也不要忘了政府管理职能，只讲服务不讲管理也不行，管理和服务不能偏废，政府该管的不仅要管，而且要管好。他还把这个问题与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③他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同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政府所起作用的本质区别，也是用党的初心校准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这个改革开放核心问题上出现的各种偏差。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问题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和行政领域，要求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健全法制和扩大民主，核心在于克服官僚主义和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后来，他还一再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④。然而，国内外敌对势力却把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当成可乘之机，拼命鼓吹西方的“宪政”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要我们学习“三权鼎立、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模式，并不断煽动在中国搞“街头政治”和“颜色革命”。有的同志受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也对“党政分工”等原则在理解上产生了某些偏差，一度提出“党政分开”等似是而非的口号，给实际工作造成了一定混乱，也使不少干部的思想出现困惑。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总结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不再提“党政分开”，而是更多地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党中央针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国内外极少数人要我们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

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页。

取消和削弱党的领导的主张，强调看待政治制度模式的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有这些，也都是用党的初心校准改革开放实践的体现。

1. 关于马克思主义语义下的政治立场

无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应当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看待政治、法律和国家的。恩格斯说，“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而“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①。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② 据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历史的惯性，我们一度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阶级斗争，并在政治运动中沿用过去进行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和经验，进而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也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直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停用了这个不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但并没有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在改革开放后修订的《党章》和《宪法》中都明确表述：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③。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针对一些同志以为那“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问题”的错误看法，指出“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他这里所说的“实质”“性质”，显然指的都是阶级斗争。我们有些同志在政治体制改革等政治问题上之所以迷失方向，说到底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问题的实质、性质看清楚。针对主张放弃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⑤ 他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在党的十九大等重要场合，凡讲到国体时总是要强调，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虽然只讲这么一句，但就像定海神针，起着稳定大局的作用。可见，讲和不讲，结果大不一样。

2. 关于选择政治制度模式的出发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有人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方向改，否则就说成不改革的错误言论，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是曲解我们的改革开放。一个国家实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0、5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8页。

③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3、364-365页。

⑤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0页。

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情，要清醒认识到引诱我们接受西方“宪政”“普世价值”背后的政治图谋和可能出现的政治恶果，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他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囫囵吞枣、邯郸学步、照搬照抄，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否则不仅行不通，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①。针对西方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应声虫极力兜售所谓“普世价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是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安全^②。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意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动向，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③他联系西方敌对势力煽动一些国家反对本国政治制度的后果，告诫人们，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④。但是，搞了西方的那套东西的很多国家却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我们头脑一定要清醒，在政治制度模式上，“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有人看到我们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为时机又来了，说什么“现代化就是要西方化”。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针锋相对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⑥他说，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只讲第二句，不讲第一句，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⑦。由于及时封堵了可能的漏洞，致使一些人拿这个问题大做文章的企图同样未能得逞。

3. 关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理论根据

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政治制度，经常拿出来说事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正面回应说“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他又着重论述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⑨。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整体不动摇^⑩。为了说明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地

① 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0页。

② 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48页。

④ 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页。

⑥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页。

⑦ 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21页。

⑧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⑨ 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46页。

⑩ 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位，他还借用毛泽东说过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①这句话，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②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归根结底由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由共产党领导而不搞“国家化”，这一切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其中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正是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了在中国，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许任何势力破坏这种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所以，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党制度也只能是由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内部当然也有不同利益的矛盾，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这种矛盾是受到限制的。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允许发展到根本利害冲突的程度，更不允许有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存在。因此，人民内部不需要有两个政党相互竞争，更不允许有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政党出来同代表最广大人民整体利益的共产党之间相互竞争、轮流执政。既然如此，军队当然也必须由而且只能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而不能实行所谓的“国家化”。否则，不仅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会被架空，军队还有可能落入野心家之手，沦为少数利益集团和军阀的工具。那样，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得到维护？党和人民的团结统一怎么会不遭到破坏？

我们党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党的领导层中也会出现腐败分子和形形色色的坏人，但这些都是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我们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改革开放后，虽然允许发展私营经济，但我们党担任公职的党员领导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也不允许私营企业成为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财团。这就决定了，领导干部中尽管有少数腐败分子，尽管有人与私营企业建立了特殊的利益关系，都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在政策制定上代表私人资本的利益，向垄断财团倾斜；也决定了我们党制定的政策、出台的决定，无论是否完善，都不可能从私人资本的利益出发。因此，不能因为党内出现了少数腐败分子，就认为党的领导不行了，就要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相反，应该通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堵塞管理上的各种漏洞，把防范腐败的工作做得更好。

至于有人自作聪明地用所谓“中国共产党至今还没有进行政党登记”为由，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那就更是荒唐可笑了。前面已经说过，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然决定了不搞多党制，当然也就用不着搞什么政党登记的法律。但是，不搞政党登记，绝不等于实行共产党领导就没有法律依据。我国早在1949年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里说的实行工人阶级领导，自然意味着实行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各民主阶级，自然意味着团结各民主阶级的政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以，无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是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参政议政资格，都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得到确认的。1954—1982年的四部《宪法》序言，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后建立的，今后各族人民要继续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爱国统一战线要继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可见，实行共产党领导，既是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选择的结果，也是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

一些人之所以总认为共产党领导“不民主”，其原因就在于把西方的政党竞选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当成了“普世价值”，拿来作为衡量我国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检验标准。然而，现在连西方学者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那种制度只不过是金钱为后盾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垄断财团愚弄选民的游戏，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社会主义民主当然也要有选举，但那只是民主中的一种形式。在我国，更重要的民主形式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性地深入群众走访，下到基层调研，同各行各业的群众座谈，和不同阶层的代表相互协商，以及接待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通过这些形式，使执政党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确保听到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声音，从而保证政策和决策能从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出发，尽可能地符合实际情况。可见，实行共产党领导不仅不是什么“一党专制”，相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是比西方以金钱为主的所谓“民主”不知有效多少倍的真正民主。

4. 关于改革和设计政治制度的原则

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无论对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设计，都关乎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发展和稳定。只要看看新时代对这方面实践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就会发现，其中同样体现了用党的初心进行校准的精神。

第一，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人们的利益关系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受到调整，从而带来维稳与维权的关系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说：从人民内部和社会一般意义上说，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人心安定，社会才能稳定。对涉及维权的维稳问题，首先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单纯维稳，不解决利益问题，那是本末倒置，最后也难以稳定下来^①。这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为维护自身权益的上访和群体事件，不能简单用维稳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而应当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来对待，凡是能解决的问题，应当认真及时负责地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也要做好充分解释和耐心说服工作。总之，在处理这类问题上，同样不能忘了党的初心。

第二，要处理好社会治理中的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②具体到民族与宗教工作，他一方面要求把握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族群众，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依法保障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另一方面，要求坚决遏制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进行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全力防范和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这三股势力。他明确指出，暴力恐怖活动“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必须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③。针对黄赌毒现象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活动，他指示政法部门“露头就要打，不能让它们形成气候。”^④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近几年新疆开展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一些地区对泛清真化的整顿，最近全国范围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都对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增强群众安全感起到了切实有效作用，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拥护。

① 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9页。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9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3页。

④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9-140页。

第三，要处理好政治性风险和非政治性风险的关系。所谓政治性风险和非政治性风险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涉及政权，带有敌我矛盾性质；而后者不涉及政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要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避免各领域风险产生交叉感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蔓延为政治性风险^①。这一论述也为新时代的政治制度改革和设计提出了重要原则。

四、关于以正面宣传为主还要不要积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总结了教训，恢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成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使学术界、文艺界出现了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景象。然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归结起来，就是邓小平说的意识形态领域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1982年，他在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中指出，一些人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艺学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还输入不少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歌舞、录像、录音等。邓小平说，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一些错误倾向是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只是效果不够显著。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②。对于这种局面，此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努力设法扭转，但由于缺乏在开放条件下抵御西方敌对势力渗透和资产阶级影响的经验，加上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上述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狠抓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接连召开全国全军的宣传工作、部队政治工作、文艺工作、党校工作、新闻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等一系列座谈会，2019年初又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在所有这些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还时常就意识形态工作做出重要批示、指示。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宣传思想工作，确实是在用党的初心加以校准。

1. 应当如何认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第一，事关政权的安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③他表示，我们党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这些问题已经被实践说明了，但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需要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④。他强调，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⑤。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

① 参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求是》2019年第14期。

②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46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65页。

④ 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⑤ 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①。

第二，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就无法前进。仅仅把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是远远不够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他说“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②

第三，事关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现在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也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更为严重的是，“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③。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改革措施，切实防止出现一些人担心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被边缘化’的问题”^④。他针对有人散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的观点，强调指出，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⑤。

第四，事关国际话语权的争夺。由于西方长期掌握着世界“文化霸权”，使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在国际上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而我们的阐释技巧、传播力度又不够，使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知晓率和认同度都不高，有时处于有理没处说、说了也传不开的被动境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的形势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进一步凸显了思想文化力量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整合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⑥

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述观点的阐发，促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高度重视的局面。

① 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页。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④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0页。

⑤ 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0-81页。

⑥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07页。

2. 应当如何理解“不问姓资姓社”和“不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有人批驳媒体上出现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往往会有人以邓小平讲过“改革不问姓资姓社”“不搞争论”为由，出来加以阻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各种错误思潮之所以一度畅行无阻，甚至有关部门对个别明目张胆、连篇累牍攻击我们党、丑化党的历史的报纸、杂志长期束手无策，与这种情况之间有很大关系。其实，只要看看《邓小平文选》就会清楚，他所说的“不问姓资姓社”“不搞争论”，是针对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在改革方向的问题上，他不仅从来没有说过“不问姓资姓社”“不搞争论”，相反，他总是提醒人们“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甚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在改革坚持什么方向的问题上“还要继续争论的”^①。他还严厉批评党内一些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不力，指出，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②。可见，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不问姓资姓社”“不搞争论”，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人强加给邓小平的，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严重曲解。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发扬我们党在宣传思想战线上一贯倡导的“真理必须旗帜鲜明”的战斗风格，对一段时间以来流行的许多有碍批判错误观点的糊涂观念、暧昧做法，给予了澄清和纠正。他明确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对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谣言和奇谈怪论，我们的党员、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软，不要听风就是雨；同时，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③

对于国内国外、网上网下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史，以及歪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歪曲改革开放历史的言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有的放矢，正面交锋”，绝不能把所谓“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当成不作为的借口，放弃舆论斗争。他要求，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不要躲躲闪闪、含糊其辞。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④。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要求，而且以身作则，面对错误思潮和有害言行带头发声，该批判的批判，该引导的引导，给宣传干部做出了示范，也给全党做出了表率。例如，针对网络空间充斥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问题，他斩钉截铁地指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利用网络进行欺诈活动，散布色情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兜售非法物品，等等，这样的言行也要坚决管控，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这样的行为泛滥开来。”^⑤对于文艺界存在的丑化英雄人物、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一味媚俗、低级趣味、粗制滥造、追求刺激、追逐名利、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现象，他尖锐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8、181、297页。

②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4、364-365页。

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209页。

④ 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4、25、45页。

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地指出,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①。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②。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③。

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铿锵有力的发声,不啻为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门负责人树立了榜样。

3. 应当如何看待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责任

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各级宣传部门固然处于第一线,但“指挥部”是各级党委,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尤其应当肩负起第一责任人的担子。

现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存在着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而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重要方面之一就是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于抓宣传思想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阅看本地区本部门主要媒体的内容,带头把住本地区本部门媒体的导向,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选好配强领导班子,对不适合、不适应的干部坚决做出调整,“确保宣传思想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他强调“对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敢抓敢管,对出现偏差和错误的要严肃批评、严肃处理,对发出正义声音而受到围攻的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坚决力挺。”他明确要求高校、院(系)党组织书记、行政负责人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做到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如果有人以所谓‘学术自由’为名诋毁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那就应该旗帜鲜明予以抵制。”对于文化体制改革,他要求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他说“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④

现在,在一些单位和一些人那里,党的意识淡漠了,党性原则讲得少了。有的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有的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各级党委和宣传思想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党报党刊党网、党政干部院校、大专院校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⑤针对少数人把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和对立的观点,他尖锐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党性和人民性。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搞碎片化,

① 参见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9页。

② 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4页。

③ 参见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④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3、49-50、55、27、185页。

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① 为了切实防止意识形态阵地成为错误思想观点的传播渠道，他还要求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它纳入巡视工作安排，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落实谁主管谁主办和属地管理，防止给错误思想观点传播提供渠道。

有人说，当下中国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舆论场；也有人说，现在是“资本为王”的“资本媒体”“商业媒体”时代，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再提坚持党管媒体没有意义；还有人说，坚持党管媒体，主要是对党和政府主办的重点新闻媒体而言的，对其他媒体并不适用。对于这些错误看法，习近平总书记都给予了驳斥。他说“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要把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守土尽责的重要使命，充分发挥制度体制优势，坚持管用防并举，方方面面齐动手，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他要求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他还多次告诫大家，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他指出“要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管理范围，所有新闻信息服务和相关业务从业人员都要实行准入管理。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拿出管用的办法。”“做这项工作不容易，但再难也要做。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要怕别人说什么。网上负面言论少一些，对我国社会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②

近些年，通过用党的初心校准改革开放中的宣传思想工作，意识形态战线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报刊对错误思潮、错误观点的批判多了，就连过去长期解决不了的个别“老大难”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党的十八大后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规定，凡是公开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对立的言论，或面对错误言论回避斗争的行为，都要受到党纪处分或组织处分。事实告诉我们，对于错误的东西就要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③。只要我们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加上讲究方法，在党的领导下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五、关于新时期还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党中央都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34年里，先后进行过1984年整党、1990年党员登记、1999年“三讲”、2004年“党员先进性教育”、2008年“科学发展观教育”等五次整风活动。然而，党风问题不仅一直没有能从根本上扭转，相反有愈演愈烈之势。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在摒弃“文化大革命”中宣传的“继续革命”理论后，有些人对于我们党是不是革命党、还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在思想上发生了动摇。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紧抓住这个问题，用党的初心校准党建方面的偏差，澄清对革命的各种糊涂观念，明确表示我们党还是要革命的，而且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3-24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6、42-43、3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1. 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要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改革开放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趁我们党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之机，抛出“告别革命”的理论；受这个理论的影响，有人又抛出我们党应当“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主张。然而，这是一个伪命题。不错，我们党早已成为执政党，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党不再是革命党了。事实上，革命的概念有多种含义，有的指生产力领域的革命，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有的指社会领域的革命，如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组织和建设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特有的）；有的指精神层面的革命，如革命精神、革命干劲，等等。我们党现在虽然是执政党，但它不是一般意义的执政党，尤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里那种执政党，而是革命的执政党或执政的革命党。我们党执政后，并不意味着革命任务的结束，而是开始了新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另外，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相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来说本身就是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他说的“革命理想”，指的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他说的“高于天”，就是指坚定这一理想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高于一切。所以，要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要害在于把“执政”与“革命”相互割裂和对立了。因此，它在理论上完全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

“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仍然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这种“继续革命”的理论当然是错误的，应当否定，而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被否定。但否定这种特定含义的“继续革命”，并不意味着否定了本来意义的继续革命。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此曾用很大篇幅做过阐述，指出，纠正这一理论的错误，“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①。可见，“文化大革命”中说的“继续革命”理论被否定，不能成为我们党不再是革命党的根据。

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初专门讲过一段话。他指出，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党的正式提法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里面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②。

我们党究竟是否应当“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党还要不要以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主张我们党不要再以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人，曾提出过各种借口和理由，但绕来绕去，目的都是一个。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打着便于吸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4-845页。

^② 参见《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299-300页。

引外资的幌子，提出中国共产党最好改个名字，叫人民党或社会党等。陈云听到这个议论后就说：“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他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延安时期，就有人提过让共产党改名的建议，毛主席说‘什么名字好？国民党的名字最好，可惜人家已经用了。’”^①还有人提出，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今后要不提或少提共产主义，只讲社会主义就行了。陈云听说后也当即表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虽然仅一字之差，却点出了两种思想的根本区别所在。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这些议论作出了进一步回应。他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②他在2015年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意引用了陈云关于“共产主义遥遥有期”那句话，并接着说“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③可见，在我们党要不要坚守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样有着高度的警觉和不可动摇的意志。

为什么共产党人必须坚守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用党的初心给予了回答。他说：“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没有了这些，就是无本之木。我们整个道路、理论、制度的逻辑关系就在这里。”^④如果前提都不要了，就完全变成了实用主义。要回到我们的本源上去认识^⑤。共产主义距离我们还很遥远，为什么必须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呢？对于这个问题，他同样用党的初心给予了回答。他说，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的努力^⑥。他还说“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了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好像这个东西太遥远，拿不准，不要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敢提，‘两个一百年’敢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敢提。我觉得，作为党章明确规定的内容，作为我们党一贯明确坚持的理想，我们要坚定信念，坚信它是具有科学性的。”^⑦

2. 要从严治党就要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

夺取政权后，共产党人之所以还要保留革命精神，除了要用这种精神继续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用这种精神对待自己，就是说，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要全面从严治党，以敢于刀刃向内和刮骨疗毒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要以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的要求落实落细。如果没有自我革命的精神，这些是做不到的。

① 朱佳木《论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页。

②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页。

④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8页。

⑤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

⑥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42-143页。

⑦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338页。

第一，没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就不可能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当前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在这个总体判断下，党中央陆续出台了“八项规定”，整治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实现了中央和省级党委巡视全覆盖，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使一大批违法违纪的领导干部受到惩处，也使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遏制。

在纪律问题上失之于宽松软，与一段时间以来对改革开放的错误认识有关，与消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也有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类问题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全国曾掀起严厉打击沿海走私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有人担心这样搞会影响改革开放。陈云听说后讲“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② 那时，还有人认为党的纪律不利于改革开放，建议在纪律问题上给干部“松绑”。陈云就此批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党的十二大前夕，陈云审阅中央报告稿，特别提议要加一段话，主要意思是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他说：目前在党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③ 党的十八大之前，这种是非不分、怕矛盾、怕斗争的情况，比起十二大之前，可以说更为严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对坏人坏事，“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抓不敢管，抱着‘鸵鸟心态’，唯恐得罪人、丢选票”^④。他正义凛然地指出，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⑤。他深刻指出，中央提出抓“四风”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从思想警醒起来，牢记“两个务必”^⑥。显而易见，这些论述都是要我们不忘党的初心，用党的初心校准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党建工作。

第二，没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就不可能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过去很长时间里，一些部门认为，在干部监督问题上，只要没有腐败问题，其他可以忽略不计；有的干部也认为，只要自己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都不在话下。受这种观念的支配，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封官许愿，阳奉阴违，野心膨胀，结党营私，目空一切，口无遮拦，有的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⑦。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⑧。

为什么要突出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呢？他解释说“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

①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页。

② 朱佳木《论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274页。

④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

⑤ 参见《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85-186页。

⑥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91页。

⑦ 参见《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⑧ 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64页。

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九十多年历史、连续执政七十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二十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①

第三，没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就不可能以上率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1986年，中央书记处提出北京市的党政军机关要在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陈云知道后，结合当时刮起的基层单位给领导人送进口汽车的歪风，在一份文件上批示“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②这个批示告诉我们，解决党风问题的关键在上层，而上层的关键在中央。此后，党中央三番五次告诫全党要保持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防止脱离群众，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都重申这个问题，并多次通过中央全会做出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定，但成效都不大。可见，我们这样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制度的政党，凡事不由中央带头，是很难奏效的。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在解决党风问题上，首先制定和落实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明确要求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③正因为整顿党风从中央政治局抓起了，做到了正人先正己，使“四风”问题、贪腐问题得到了迅速而有力的整治，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较程度的恢复和发扬，党的形象和威信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提升。

3. 要顺应当今时代发展趋势就要继续做革命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不仅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还反复提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他之所以一再突出“革命”二字，与他对时代性质的深刻认识有着直接关联。

前一时期，有人提出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言外之意是，现在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更不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了。这种看法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亵渎，也是对党中央精神的篡改。关于时代问题，改革开放后的历届党中央的提法都是讲，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问题、主题、课题、特征，从来没有说过现在不再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的时代，也没有说过现在不再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时代特征与时代性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说时代性质变了，社会主义还有前途吗？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时代依据吗？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就时代问题做过多次论述。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3-134页。

^② 《陈云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43-544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87页。

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① “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② “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也会出现曲折，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③ 显然，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历史时代，只能是马克思、恩格斯指明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以及列宁、毛泽东指明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他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正因为当今仍然处在这样的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仍然没有改变，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有依据，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才有前途，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才有必要。

反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要义和特色。这一思想对于共产党人挺起自己的精神脊梁，以更加高昂的革命精神面对当前和今后复杂艰巨的国际国内斗争形势，抵御各种风险和挑战，经受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考验，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 95 周年大会上讲“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④ 本文所讲的五个方面，就是新时代用党的初心校准改革开放实践，不忘过去、面向未来、继续前进的具体表现。这种校准工作当然不限于这五个方面，在其他方面，如在科技创新、军事变革、外交布局等领域也有表现。目前，这一校准工作有的已初见成效，有的还在进行，有的则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但无论前面有多少困难，如何使改革开放更能体现党的初心、更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探索进程已经开启。只要我们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明的方向继续前进，更能体现党的初心、更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改革开放新天地就一定会呈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
- [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3] 《陈云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编辑：谭晓军)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17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66 页。

③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0-11 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32-33 页。

MAIN ABSTRACTS

Adjusting the Practic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erms of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the Party

Zhu Jiamu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has constantly adjusted the practic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erms of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the Party. All the practices that accord with the Party's original aspiration we should adhere to and develop, and we should adjust and correct them otherwise. The so-called Party's original aspiration is wha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ften says, to adhere to the belief of socialism, communism and Marxism, to seek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serve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never to isolate oneself from the people, and never to ignore the people's sufferings. The so-called adjusting the practic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erms of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is to evaluate and check the practic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above, which includes wheth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ve a direction and what kind of direction they should take, whether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sticks to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whether the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sists in the basic socialist political system, whether we take active actions in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while publicizing positively as the main method, whether we need a revolution in the new era, etc. As long as we move on along the direction pointed out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an we embody the Party'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open up the new fiel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re popular among the people.

Xi Jinping's New Contribution to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Wang Yi and Tian Yuqing

From th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tood at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ist cultural confid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foundly explained th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t value of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proposed to cultivate the new gener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focus of cultivating and promo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emphasized the need to cultivate and promot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rough education guidance, media publicity, cultural edification, practice encouragement and system guarantee. He elucidated the new orientation to insisting in socialist core values system in the new era, revealed the new goal of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new era, and pointed out its new dimension, which provides scientific guidance and observing value for carrying out great struggles, building great projects and advancing great undertakings in the new era.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n "Living Needs"

Hu Leming

"Living needs" is a basic categ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also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Marx didn't define "living needs" clearly, he discussed the type and system of living need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hich made this category play a "main secret role" in Marx's study of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surplus value, and crisis theory. Taking Marx's approach as the reference, we classify the type of living needs from perspectives of the subjective, objective and level of needs and its satisfiability, and discuss in detail common needs, individual needs and family needs and ways to satisfy them, which means functions of system arrangements for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familie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ust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bsorb scientific elements of western economics, take "living need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mpletely analyse all